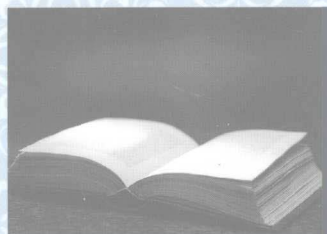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文学·文本·文化
——80年代中篇小说个案研究

石天强／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航空航

文库

文学·文本·文化

——80年代中篇小说个案研究

石天强／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文本·文化:80年代中篇小说个案研究/石天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ISBN 978-7-301-21396-4

I. ①文… II. ①石…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0697号

书 名: 文学·文本·文化——80年代中篇小说个案研究

著作责任者: 石天强 著

责任编辑: 闵艳芸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396-4/1·252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weid02@sina.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2.25印张 180千字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7.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序言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阐释	001
第一章 多样的现实世界	014
第一节 分裂的历史状态	014
第二节 内在世界的拓展	026
第三节 语言和帽子	036
第四节 别样的空间	048
第五节 精神世界的衰败	059
第二章 先锋的异质色调	071
第一节 忧伤的文化之“根”	071
第二节 被颠覆的历史	082
第三节 童年记忆中的乡土	093
第四节 叙述的迷宫	104
第五节 都市顽主	115
第三章 世界的别样容颜	127
第一节 “烦”的个体世界	127
第二节 “风景”的背后	138
第三节 暴力下的生命	149
第四节 人性的悲凉	160

第五节 个体的沉沦	171
结语	182
参考文献	189
后记	193

序言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阐释

—

本项研究拟以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篇小说为案例,思考文学文本的内部构成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副标题中,特别提到了“个案”两个字,就是为了说明本项研究不属于文学史的范畴,而且无意梳理出一个有条理的、系统而完整的文学史发展脉络,或者试图通过这个脉络说明一个隐藏在文本世界背后的真理。这并不是说论者否认真理的存在,也不是在否认文学史梳理中内在的思想脉络;而是在表明,真理的确存在,但永远是一定视角思考下的真理。这一态度也决定了本项研究不是还原性的,而是视角性的。

首先对研究中的一些关键词做初步的说明。

1. 文学

在近年来的文学研究中,“文学”这一概念的处境日趋尴尬,^①这与“文学性”的频频出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语言的组织结构上看,“文学性”(literariness)是一个比“文学”更为模糊的词,在语言的外延上,也要远远大于“文学”。这似乎暗示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更为复杂而矛盾的

^① 关于文学及其发展所面临的尴尬境地,王一川在《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一文中有很好的论述。该文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精英文学在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冲击下不得不调整自身的生产和消费策略,以保住其存在的空间。该文断言“精英文化不会衰落,关键是要有属于 20 世纪 90 年代生存情境的新的创造”。参见王一川:《杂语沟通》,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3—21 页。

社会心态:一方面许多研究人员或者是专业从业人员在固守一种具有形而上色彩的“文学”概念;另一方面,人们又清醒地意识到,现实社会环境中复杂的文学活动、文学现象是很难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这个概念梳理清楚的。而这也是“文学性”这个词得以存在的文化背景。

对于“文学”,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有以下几种概括,可以说是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今天学院中人的研究态度:

其一,文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标志,即人们认为是文学的那些东西。

其二,文学是一种可以引起某种关注的言语行为,或者叫文本的活动。

其三,文学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而它之所以特殊似乎来自于它得到了人们特殊的认识和注意。

卡勒最后对文学总结说:“我们可以把文学作品理解成为具有某种属性或者某种特点的语言。我们也可以把文学看做程式的创造,或者某种关注的结果。哪一种视角也无法成功地把另一种全部包含进去。所以你必须二者之间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位置。”^①卡勒对文学理解的特点在于,他以一种折中的态度对待这个概念:一方面在努力建构关于文学的各种话语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又在有意识地解构既有的建构,从而维持主体阐释与被阐释对象之间的一种张力。而这种姿态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主体在有意识地避免将一个既有概念本质化的同时,维持这个概念的流动变化的一面。卡勒的这种论述姿态的确给国内很多学者以启发,例如在王一川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对文学的解释就已经变为“文学是一个含义不确定的词语,……在现代学术分类意义上,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是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的艺术样式”。^②与卡勒的论述相同的地方是,与过去强调一个概念确定性的一面相比较,现代学术话语更强调这个概念不确定性的一面,强调这个概念得以生成的社会话语背景。任何一个概念都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完成的、自我同一的整体,而概

①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② 王一川:《文学理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2页。

念、术语则成为各种话语力量矛盾、冲突、争夺的场所；它们有相互同一的一面，同时还有相互分裂的一面。

应该说卡勒这种对待概念的姿态和论述方式是十分有意义的。回到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我们就会看到，即使是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中，对“文学”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文学文本在组织结构、叙述方式、审美态度等多个方面的变化。在面对这种变化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面对“文学”这个概念的流动性、异质性、未完成性等方面。也只有将“文学”视为一个变动的、发展的实践过程，我们才可能把握住问题更深刻的一面，并有效地解决逻辑推理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而这就是所谓的“文学性”的一面。可以说正是这一面正在解构关于文学既有的描述，并激发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而且也可以说是“文学性”这个概念，不断拓展人们的文学观念，并不断为“文学”注入新的活力。

2. 文学性

对于“文学性”，一般的解释就是“文学的特性”。但哪些方面应该包括在文学的“特性”之中就又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了。例如卡勒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就谈到，文学性(literariness)似乎是存在于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的一个重要中介。在王一川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所谓的“文学属性”(literary property)是指“文学所具有的共同特性”，而“属性”(property/attribute)是不同于“本质”(essence)的——后者指事物之为事物的终极原因。^①在此，我们面临的实际是与关于“文学”的话语一样的问题，而且我们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对这一问题处理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关键并不在于哪些因素是文学所特有的而哪些又不是；关键是什么样的文化语境参与到了塑造文学文本的内在构成之中，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成为影响“文学”概念描述的主要力量。

我们注意到在历史进程中，文学实践与文学概念一直处于一种激烈

^① 以上分别参见[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20页。王一川：《文学理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的碰撞过程中,并总是由于文学实践的不断越界而使相对静止的文学观念处于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而“文学性”几乎成为拯救文学存在的重要手段,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文学实践与文学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张力在近年已经发展到了质疑文学独特性、合法性存在的地步,如卡勒即认为:“由于不同的原因,有些文本内涵更丰富、更有影响力,或者说更具有典范作用、更具有可争辩性,或者更具有支配性。”注意卡勒在此用的是“文本”这个概念,这是一个与“文学”概念,尤其是与“文学经典”根本不同的概念,其目的就是为了取消文学作为被阐释对象的独特性。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非文学文本可能比文学作品更具有典型意义,更能体现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心理,也因此引出一个问题:理论研究者是否还需要一直阅读文学作品吗?而文本和文学之间的可通约性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非文学文本中可以发现所谓的“文学性”:
“人们通常认为属于文学的特性其实在非文学的话语和实践中也是必不可少的。”^①其实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而且这种碰撞也一直在发生着,杨周翰先生在讨论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之间的关系时就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②此不赘言。对此,我们依然要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去看待这一问题,而且为了保持这个概念特有的张力,我们必须保持与研究对象的距离,从而使我们的论述具有自反性。

3. 叙事

卡勒认为:“文学和文化理论越来越认为记叙在文化中占有中心地位。这个理论认为,不论是把我们的生活看做是通向某个地方的一系列连续发生的事情,还是对我们自己讲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是我们理解事物的主要方式。”^③进一步,叙述似乎在人类生活中占有一个本体的地位,尽管不少理论家更愿意将叙述视为一种人为的结果,如杰姆

①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② 见杨周翰:《历史叙述中的虚构——作为文学的历史叙述》,出自《镜子和七巧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③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6页。

逊就认为：“一方面叙事是一系列的谎言，编造出一个英雄；同时叙事又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之一。”与卡勒一样，杰姆逊也看到了人类叙事中所存在的矛盾的一面，并认为这将直接导致叙事真理性的模糊。^①叙事性文本是一个比传统的小说、戏剧等文体划分都要大得多的概念。从叙事的角度看，包括社会新闻报道、散文，甚至是诗歌中的叙事诗都可以划分到叙事性文本的范围中来。卡勒甚至讨论了叙事在人类文化生活中所具有的“元”地位。^②因此，我们在此必须对本项研究中的叙事性文本进行界定：此处的叙事性文本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同时与小说相关的关于文本的阐释、论述、介绍、争议等等方面都成为小说文本的扩展，成为这个小说文本在语言上的繁殖，并与小说构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性关系。而这也是本项研究使用“叙事性”文本，而不是“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本项研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小说，还包括与小说有关的各种文本、文献资料。可以说关于“文学”的观念，或者说是关于“文学性”的争论就是存在于文本与关于文本的争议之中的。我们也是在这种争论中看到在历史语境中文学观念的生成、发展与变化。

二

在上面对一些关键词的梳理中，我们已经看到“文学”概念在历史进程中不是越来越清楚了，而是越来越模糊了，对文学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围，进入到了“文本”的层面上。如果说，关注文学就是关注想象性语言世界中的审美因素、叙述特征、组织结构等内在特征的话，那么关注“文本”也就要关注语言世界的外在构成力量。前者在文本世界中依然存在——这就是文本所具有的“文学性”的一面，但前者并不是构成文学世界的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应该存在于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共构的张力中。而这就决定了文学产品不仅仅属于文学，它还具有文化特征。

①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6页。

②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97页，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

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即将文学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对其重新审视,力图发现文学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①这与 80 年代的文学研究形成了对比。20 世纪 80 年代,对文学的研究强调文学文本的自足性、独立性、审美性等“艺术”因素;同时在文学创作上追求所谓“纯艺术”的表达方式。这种主观上的追求无论是在文学实践上还是在理论研究上都促进了文学由“写什么”向“怎么写”的转换,并对促进新时期以来文学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文学的讨论中,我们常见到的关键词涉及到“向内转”、“重写文学史”、“主体性”等等。鲁枢元即认为文学的“向内转”就是“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而“重写文学史”则是“着眼于审美角度,排除非文学因素干扰,侧重于文学的自身价值及发展规律,以个人的体验而不是集体的经验对一些富有影响的作品进行再解读”;“主体性”概念的核心则在于突出其中“人”的因素,并重申了“文学是人学”这一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命题。这些命题的讨论最后又都归结到突出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因素上来。^②

应该说,传统的文学研究对文化研究有一种强烈的排斥心理,而且文学与文化之间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的争论充满了对精英统治的抱怨和认为研究通俗文化将会给文学带来灭顶之灾的指责。”^③也因此,文化研究一直面临着存在的合法性的问题,尤其是当大众文化对文学形成了强烈冲击的时候;同时,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也形成了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化研究是有文学研究的血统

① 将文化研究引入文学研究,从而梳理既有文学关键词中隐含的话语权利 and 知识谱系,国内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尝试。例如在《当代文学关键词》一书中,陶东风对于“主体性”一词的梳理就是引入法国著名社会学学者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得出了很有意思的结论。参见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60—170 页。

② 以上论述可参见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第 174 页、203 页、165 页之相关词条介绍,著者分别为鲁枢元、周立民、陶东风。《当代文学关键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关于“主体性”论争的详细情况,还可参见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证评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年。

③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56 页。

的。发轫于法国结构主义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在根源上深受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及其代表的“细绎”集团的影响。但在结果上却与其老师截然相反。尽管利维斯很早就开始关注大众文化,但其目的却是为了证明大众文化意味着道德败坏和社会文化的贫乏。利维斯借此呼吁,文学应该保持其高贵的身份,而这种高贵正是属于英国文化中的“伟大的传统”的。而后来的英国与法国的文化研究者则突破了利维斯的局限性,通过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重新诠释了大众文化——尤其是属于社会底层与边缘的各种亚文化形态,并开掘了其中蕴涵的解放的、积极的、反抗的一面。因此如同卡勒所认为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不见得是必然矛盾的;相反,二者是可以相互借鉴的:“文化研究就是把文学分析的技巧运用到其他文化材料中才得以发展的。它把文化的典型产物作为‘文本’解读,而不是仅仅把它们作为需要清点的物件。反过来说,如果把文学作为某种文化实践加以研究,把文学作品与其他论述联系起来,文学研究也会有所收获。”^①

将文化研究引入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文化研究更关注社会中文学文本的非自足性。文学作品的生产不是作家闭门造车的过程,相反,作家总是处于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权力话语的压力之下的。同时在对作品的接受上,文化风气、社会时尚、社会心理、生产组织、文化制度等因素会在各个方面影响人们对作品的解读。因此文学文本不是一个自足的世界,而是通过各种形式与外在世界发生种种关联。同时文化研究的认识方法与过去的社会—反映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反映理论具有线性机械论的色彩。现实中出现的文学现象必然反映着社会存在中某种本质的、必然的规律;而且这种被揭示出来的规律又必然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而文化研究所强调的这种社会属性则不同。雷蒙·威廉斯就认为:“分析文化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在这个语境下分析特定的作品或体制,就是去分析它们的组织的基本种类,分析作品或制度作为总体组织各个部分而加以体现

^①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0页。

的关系。”^①显然,无论是文本还是体制都只属于特定的时代,同时在文本和体制中所反映的是复杂的组织结构关系。社会反映论中文本和社会组织结构之间简明的线性关系被打破了,无论是文本还是结构都蕴涵着更为错综的内容,同时对文本和组织结构关系之间意义的揭示不再具有普遍的、绝对的价值,它们只属于这个时代,只属于那个特定的组织结构关系。

其二,将文化研究引入文学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学文本中一些原来被忽视的因素被突出了出来,例如性别、身份、种族、地域、年龄、身体等诸多方面。我们将看到文学文本的世界中充满了上述各种复杂的因子,它们以各种方式,在意识层面或无意识层面影响着作家的写作、读者的接受。事实上,这些因素的突出与文化研究关注问题的方式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在文化研究中,阶级、性别、种族等问题一直是研究关注的重点。与此前不同的地方是,这些概念不是内在统一的、一致的,而是充满了矛盾性、异质性的。例如文化研究并不认同阶级本质论——即同一个阶级必然持相同的阶级观念、文化价值观念。汤普森即认为:“‘它’,工人阶级,被假定具有一种真实的存在,几乎可以精确地加以界定——如此众多的人们都与生产手段处于某种关系之中。”^②而研究者的目的只是去发现并揭示这个阶级所共有的本质。在文化研究者看来,所谓的“工人阶级是一个描述性术语,既难以捉摸又具有明确的意义。它将一大堆分离的现象松散地联系在一起。此处的裁缝,彼处的织工,他们一起构成了工人阶级”。^③因此,同一个阶级、阶层,其内部文化是充满了内在张力的,而张力的形成来自于同一阶级成员内部存在的种族、性别、年龄、地域等差异的存在。它具体地生长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它是

①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赵国新译;参见罗刚、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② [英]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赵国新译;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

③ 同上书,第138页。

一种“历史现象”，一种在历史中“实际发生的某种事物”。^① 因此，同一阶级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文化研究的目的就是试图描述出这种内在的差异，并力图发掘这种差异背后隐藏的话语运作的方式。

其三，文化研究提供的研究视角与传统社会—反映理论提供的研究视角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相信世界的单一性、话语的不容质疑性，特别是相信话语可以为作者和读者提供坚实有力的解读武器，“武器一经人民掌握就会产生改变世界的力量”^②。而文化研究是视角主义的，它承认自己在理论资源和理论思维上的局限性，并且强调对文本理解的多元性特征。“视角一词意味着每个人的视点或分析框架绝不可能完全如实地反映现象，它总是有所取舍，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观察者本人先有的假设、理论、价值观及兴趣的中介。视角这一概念同时也意味着没有哪个人的视点能够充分地说明任何一个单一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更不用说去完全地说明一切社会现实的无穷的联系和方面了。”因此，“一个视角就是一个解释社会现象、过程及关系的特定的切入点”^③。而理论所提供的不过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已，它不能提供终极理解。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本项研究将关注文化语境对文本内在组织结构的渗透，在注重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思考文学内涵生成的文化特征，从而在新的理论视野中重新理解和界定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关系，重新理解文学存在的意义和特性，并与当下的文化现实紧密结合，以促进文学力量的发展。当然，我们必须十分清楚一点，文化研究在本项研究中始终是一种研究手法和手段；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文学，其归宿还必须回到文学自身上来，“文学，既不能像 20 世纪 80 年代那样被视为可以抵消‘文革’式政治侵蚀的‘审美’作品，也不应像时下‘文化研究’主张的那样纠缠于复

① [英] 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赵国新译；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38 页。

② [德] 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1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年。

③ [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与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第 339—340 页。

杂的政治或权力冲突中”^①。我们应该认可,今天的中国文学仍然有自己的空间;而这也是今天的文艺学得以存在的根源所在。

三

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认为,好的批评理论之所以有其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其衡量标准并不是看该理论的单个命题能否得到科学的证实,而是看它在揭示单一艺术作品内涵时的范围、精确性和一致性,看它能否阐释各种不同的艺术”。^②或许将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文学思考依然存在着争议,但只要在研究中注意保证思维的一致性,并成功地对文学文本进行了阐释,就可以维护这一研究思路存在的合法性。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篇小说。我们从研究对象的界定上马上就可以看到,要想在一个研究课题下穷尽全部叙事性文学文本这一想象本身就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本项研究所做的进一步限定:本项研究并不想穷尽全部叙事性文学文本,这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按照一定的逻辑推理关系进行特定的理论预设,并力图在历史中发现相关的文学文本对这个预设予以证明。这种逻辑关系决定了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手段及结论所具有的理论局限性和思考的视角性。本项研究并不回避这个理论基础。

这种对问题的思考方式决定了研究对历史文化中相关文本选择的局限性,由于研究只能对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特定文本进行选择,而且只能选择相关的文学文本,这就决定了研究最后的结论并不是建立在对全部历史梳理的基础上的;而且研究所进行的思考只能建立在对文学史中“个案”思考的基础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本项研究的基本逻辑关系是:

1. 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中的相关个案进行研究;
2. 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并发现每一个个案研究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

① 王一川:《文学理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0页。

② [美]M. H.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郇雅牛、张照进、童庆生译,王宁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3. 将由这种逻辑关系中得出的结论上升到文学本体的地位,思考这个结论在文学理论视野中的合理性、有效性、局限性。

这个思路实际上涉及到文学史与个案分析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史重新书写得以建立,实际是以对文学史中每一个个案重新思考为基础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上海文论》为基地展开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恰恰开始于对现当代文学中重要作品的再解读。将新的知识话语引入既有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再认识中,从而发现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新的意义和价值,无疑为文学史的再写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对文学作品的再解读“是对具体文本的再阐释,更重要的是文学史重构的组成部分。它是对文学史图景、描述方法等的一种实验”。^① 事实是,文学史就是一个通过对文本的再认识而不断被重新改写的历史,也是在这种改写的过程中塑造新的文学经典、新的话语规范、新的评判标准。^②

我们还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已经看到,本项研究实际上是一种个案研究的累积。所有的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关于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这样对于个案的选择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选择什么个案,排斥什么个案都暗示着论述者的论述视角、论述方式方法以及论述局限。因此本文在此再一次强调研究的视角性和不全面性。这就决定了研究的结论也是具有局限性的。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关于文学的结论必然面临着普遍性和具体性之间的张力问题。而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直是研究者十分头疼的。我们在此所能做的不是强调研究结论的普遍有效性,而是强调研究的逻辑合理性;而且这种逻辑合理性必然不是宏大而普遍的,而是视角主义的。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的,理论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而英国文化研究者的观点似乎可以给我们以另

①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2页。

② 王晓明:“譬如在‘当代文学’的范围里,洪子诚和陈思和两位先生的文学史著作的出版,就仿佛黄昏时分的收兵的号角声,让人知道,有一些刀戟是可以收检入库了。”参见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卷,《序言》第7页,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这实际上是在确立新的文学史写作的范本,通过现代学术生产与传播体制而形成一种新的写作惯例。

一种启示。在对工人阶级亚文化的研究中,伯明翰研究中心的学者采用了一种被称为“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即要求研究者亲身深入某一社群的文化中,并在其中长期生活从而从文化内部发现其中的意义;同时研究者还要尽可能“放弃批评读者”^①的思维模式。尽管英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研究总是存在着某种理论上的预设,而且这种预设的出现否定了—个客观的“客体”的存在,“文本中再现的客体,并不是一个客观事件或事实,而是在某一其他社会实践中已经被赋予意义的东西”。^② 同样地,当我们回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时,我们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重新建构那个文化氛围、历史语境;当然,这种重构不可能是客观的,而是包含着特定历史背景与知识背景的前理解在里面的。

在个案的选择上,本项研究将注意到以下一些问题:

1. 所选择的个案主要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中篇小说。80年代中前期承继了“五四”以来张扬个性解放、追求个体价值和尊严的人道主义精神传统。本项研究将注意到这一时代特征给作家写作、读者接受带来的影响,努力思考在文本世界中的文化心理内涵。

2. 所选择的个案均为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叙事性产品,并被当时的社会理解为“文学”的作品。一些具有特定艺术价值和社会含义的作品自然会被纳入到研究思考的范围中来。

3. 个案的时间性分布,即所选择个案在时间发展阶段上的合理性分布问题。本项研究的时间跨度在12年左右,从1980年到1991年。研究试图通过个案研究的特性,理解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所在。大致上,我们按照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一般性认识,将从1980年到1990年代初期的文学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其一是1980年前后,以所谓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为代表的社会文学思潮。其二是在1985年前后出现的所谓“寻根文学”以及大量运用西方现代主义手法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三,是1987年左右出现的所谓“新写实”作家群体,这可以视为

① [英]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陈永国译,第49页;参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同上。